

堵住“小口子”，严防“大事端”

本报评论员 林琳

近日,电视专题片《正风反腐就在身边》在央视播出,其中的一集揭开了福建泉州欣佳酒店“3·7”坍塌事故的内幕及诸多细节。看罢对相关细节、过程的还原,很多人的一个共同的感受是,“堡垒”往往是从内部攻破的。不少人记得,去年新冠肺炎疫情暴发没多久,用作集中隔离的福建泉州欣佳酒店发生坍塌,71人被困,最终29人不幸遇难。彼时,人们纷纷慨叹“这是比病毒还可怕的噩梦”。如今看来,这绝不是什么意外。

调查显示,欣佳酒店从2012年地基开挖起,就是一栋违章建筑。没有取得任何合法手续,雇佣没有资质的施工队,几年后私自改建加层、开成酒店,使用中多根钢柱变形……埋下种种隐患后,这一违章建筑终于在2020年3月7日酿成恶果。

这样一栋有着先天缺陷,后天又“为所欲为”的违章建筑,何以存活多年?从调查中可以看到,在这一酒店“从生到死”的过程中,相关职能部门的公职人员扮演了重要角色。他们当中,有街道办事处相关领导,有消防部门干部,有公安分局治安大队相关领导及专管民警等。这些人,有的是拿人钱财后,目无法纪,违法违规为人办

事;有的是渎职、疏忽,工作中毫无责任感,不担当、不作为,怎么省事怎么来,随意签字、同意、通过……更尴尬的是,帮这栋建筑逃避消防检查的消防干部参与了酒店坍塌后的救援,“那时才意识到,自己的行为造成了多么严重的后果。”

事实上,这种“堡垒”从内部被打开口进而被攻破的情况,现实当中并不鲜见,就像这次《正风反腐就在身边》纪录片披露的“孙小果”案,帮助其逃避处罚、违法违规减刑的同样是相关公职人员。

或许,有人当初并没意识到自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失职之举、自己“收点钱办点事”的权钱交易动作,最后会导致多么严重的后果。有人可能以为,“我这里开个小子口不要紧,后面还有其他人把关呢。”而实际上,每个人开一个小子口,最后往往会撕开一个大口子;每道关口都“通融”一下,最后往往会“通融”出噩梦和悲剧。这一点,从相关案件动辄牵涉数十名甚至上百名公职人员便可见一斑,这些人都会面临不同程度的处罚,处分甚至成为阶下囚,但那些因他们而逝去的生命显然无可挽回。

“堡垒”如何筑牢?如何让广大公职人员

面临诱惑和围猎,面对朋友圈、熟人圈的请托,有更强的抵御、拒绝能力?让其从那条利益交换、徇私枉法的船上下来,站到遵纪守法、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船上?

答案应该是,对公职人员、对权力进行全方位、全链条的监管和制约。要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让权力没有任何腾挪、交换、滥用的空间,尤其要对一些实权部门和人员加以监督和制约,防止关键岗位上“一个人说了算”“小官巨贪”;要加强追责、问责,让那些已经腾挪、交换、滥用了权力的人,尽快被制度和法律、被坚守底线和担当作为的人揪出来,而不是被某一次事故、某一个事件“意外”曝光出来;要通过加强警示教育等,坚定公职人员的理想信念、初心使命,整肃风气,净化队伍;要通过科学的考核、评价机制,保证公职人员“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要畅通外部监督、举报的渠道,等等。

正风反腐,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从相关案件中吸取教训,避免相关部门和人员在同一条河里不断“湿鞋”,避免类似悲剧的重演,必须筑牢制度之堤,必须强化监督力量。



苏墨

“我刚到北大红楼工作时,隔壁是李大钊曾用过的办公室,两个房间只用一根绳子隔着,观众参观的时候有意无意会到我办公室看一眼,感觉很荣幸也很奇妙。”北京新文化运动纪念馆陈列展览部主任陈翔告诉我,从2001年国家文物局决定在红楼一层设立“新文化运动纪念馆”时,他便在这里工作。

“来这里工作就是要把先辈们的功绩和遗志呈现给后人,这是我的初心。”为庆祝建党100周年,北大红楼正在进行第三次整体布展升级。此时距离陈翔退休的时间,只剩一年。

在如今高楼鳞次栉比的北京,位于东城区五四大街和北河沿大街街口处的这座通体红色的四层小楼看起来已不甚雄伟。但在103年前,它的出现却让这座风雨如晦的城市为之一亮。

收藏其中的每一件展品,都真实地见证了历史,让人们深深感受到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时期,革命先辈们炽热的爱国壮志——参加五四运动的学生散发的传单,李大钊担任北大图书馆主任时的办公室、毛泽东工作的阅览室以及北大学生上课的大教室等,都保持了原貌;蔡元培就任北大校长的任命状、李大钊和鲁迅等人的信件、陈独秀和胡适等人的白话诗稿等,也都驻留于此。

通过历史文字材料、图片介绍和陈列的展品,让五四精神活起来,让参观者在这里汲取精神力量,是这座纪念馆的初衷,也是馆员们一直努力的方向。馆内的留言册记满了到访者的感动和决心:“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接过五四火炬!”“百年传承,今日到我,激荡未来,壮志在我,青春万岁,强国有我!”“这精神是一团火,划过民族的夜空就不曾熄灭过;这精神是一道光,成为驱动中华民族加速迈向伟大复兴的蓬勃力量。”字字句句都流露出一种传承、前行的动力。

在采访中,我被新一代青年人以奋斗书写青春价值的行动、作为,一次次打动、激励。

北京师范大学2016级毕业生古丽加汗·艾买提毕业后回到家乡,扎根边疆,为教育事业添砖加瓦。她的同学、校友中有很多人已奔赴祖国最需要的地方,不管条件是否艰苦、恶劣,他们都用青春和汗水承担起属于青年一代的责任。

一线科研人员陈琳博士,为了国家科技力量的发展,虽多次面对高薪高福利的诱惑,仍坚定地选择坐“冷板凳”、“啃硬骨头”,在技术“无人区”闯出一片天地。面对科技“卡脖子”的难题,有这样一股青年力量在,祖国有信心,人民有底气。

浏览“旅行攻略”会发现,不少年轻人在北京游览路线中,会特别提到红楼,并将之命名为“朝圣之路”。他们穿着五四学生装、手捧书本,在这里留影,感受百年前的历史氛围,寻访厚重的红色记忆。

“打卡红楼,不忘先烈来时的路,才能站在新的历史起点知道自己该走怎样的路,该怎么走好这条路。”某银行的职工在疫情期间仅用三天,便创新出了为中小企业量身定制的“战疫贷”组合产品,为200余家企业解了燃眉之急。

与百年前的青年一样,新时代的青年正在迅速成长为国家可以依靠、信赖的重要新生力量。红楼不语,它默默期盼着一代代青年有更多新作为!

这里,见证红色力量的传承

不能让“黄牛”的灰色生意架空“限高令”

戴先任

据1月25日澎湃新闻报道,一段时期以来,不少为被法院限制高消费(简称“限高”)人员提供订高铁票和机票服务的“黄牛”,活跃在各类社交软件、网络群组中,藏匿于网络平台的各个角落,有的甚至在知名电商网站开起了网店。

限制高消费,是由法院发出的打击“老赖”的一种有效措施。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限制被执行人高消费及有关消费的若干规定》,“限高令”包括限制乘坐飞机、列车软卧、轮船二等以上舱位,限制乘坐G字头动车组列车全部座位、其他动车组列车一等以上座位等。此举让很多“老赖”寸步难行,不得不主动还债。

然而,就在法院“限高令”不断取得成效的同时,网上却出现了一些“黄牛”,为被限制高消费人员提供“专属”服务,一定程度上导致法院“限高令”失去了应有的功效,而且可能助长“老赖”的嚣张。

“黄牛”之所以能够帮被限制高消费人员订到机票、高铁票,有的是通过“写代码”等技术手段使“老赖”信息绕过相关数据库而不被识别出来,进而正常出票;有的通过境外购票系统买票,绕开国内数据库的检测;还有的通过修改护照号码字母等方式蒙混过关。

这些“黄牛”的行为已经涉嫌触犯法律。比如,修改、篡改民航系统数据,可能构成非法侵入计算机信息系统罪;长期以此为业,实际上是经营了不被法律允许的生意,涉嫌非法经营罪;而帮助失信人不履行判决和裁定,也可能成为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的共犯。

“限高令”在“黄牛”的操作下失效,对法律和社会造成的危害不容小觑。相关部门必须对这种行为加大打击力度,维护司法权威,督促失信被执行人主动还债、履行相应义务。

同时,相关网络平台要守土有责,配合相关部门开展打击行动,让“黄牛”无处遁形。铁路、民航等也有必要根据实际情况不断完善和优化相关数据系统和检测体系,尽最大努力堵住可能的漏洞。

总之,不能让“黄牛”的灰色生意架空法院“限高令”。



G图说

生财有道?

据《人民日报》报道,目前,全国汽车保有量达2.8亿辆,随之而来的是与汽车维修保养相关的纠纷快速上涨。有数据显示,2020年上半年,与汽车及零部件相关的投诉达1.8万件,同比增长14.4%。

汽车维保市场生意旺盛,对于相关行业而言是快速发展的好机会,本应努力从数量制胜逐渐发展到以质取胜,进而在市场竞争中站稳脚跟。然而现实是大到一些4S店,小到一些汽修店,为了抢食市场,从小病大修、零件以次充好,到霸王条款、先弄坏再维修,乱象不一而足,严重侵害了消费者的权益。不论是从事维护市场和行业健康发展的角度,还是从保障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角度,有关方面都应加强对这些问题的反应能力,引导行业转变服务模式和理念,走规范经营、合法经营之路。

赵春青/图 弓长/文

给畸形加班画出红线

戴圣宜

据1月25日新华社报道,近期,“996”“007”“715”“白加黑”等过度加班问题成为社会焦点。24日,上海市政协常委、上海江三角律师事务所主任表示,建立科学的“过劳死”认定体系,加大对企业违法延长劳动者工作时间的处罚力度,有助于约束过度加班现象。

近年来,过度加班成了一些职业和岗位的常态。国家统计局2020年12月公布的数据显示,2020年11月,全国企业就业人员周平均工作时间为46.9小时。之前,权威媒体的报道提示,要重视一些地方出现因员工工作压力大而导致“过劳死”的问题。

当前,不少行业面临激烈竞争和发展压

力,就业市场也存在不同程度就业难的问题,这些因素与畸形加班文化的出现关系密切。比如,一些企业吹捧“加班光荣,不加班可耻”,不少劳动者的周末和其他法定节假日都被工作挤占。

劳动诚光荣,过劳却可悲。过劳造成劳动者身体透支、健康受损,甚至可能“要命”。按照劳动法的规定,“用人单位应当保证劳动者每周至少休息一日。由于生产经营需要,经与工会和劳动者协商后可以延长工作时间,一般每日不得超过一小时;因特殊原因需要延长工作时间的,在保障劳动者身体健康的条件下延长工作时间每日不得超过三小时,但是每月不得超过三十六小时。”而现实中,违规加班的现象却不时出现。

这当中很重要的原因是相关法律法规还没有长出足够锋利的“牙齿”,有些规定被

“束之高阁”,企业违法成本较低。比如,劳动者“过劳死”后,其近亲属代其维权往往较难。而根据《劳动保障监察条例》的规定,企业违法延长劳动者工作时间的,将被“给予警告”“责令限期改正”,并可以按受侵害的劳动者每人100元以上500元以下的标准处以罚款。这样的处罚力度,对一些企业来说犹如隔靴搔痒。

因而,建立科学的“过劳死”的认定体系和标准,明确“过劳死”的概念,并通过立法确认相关责任归属;加大对企业违规加班行为的打击力度,对弥漫于职场与社会的畸形“加班文化”予以遏制,是接下来应当关注和推动的议题——社会的发展,不能靠透支劳动者的健康来交换。

加大执法惩处力度,给畸形加班画出精准而明确的红线,是加班族们的共同呼声,也是相关部门应该承担的职责。

二姐远嫁辽川,三姐远嫁玉树”“三个姐姐多有造化,都是幸存者”,受到舆论一致批判。后来,涉事演员在致歉时表示,不应当在表演中提及全体同胞的伤心事,这是对全体死难同胞的不尊重等。

“人之初,性本善。”相信绝大多数人都有悲天悯人的“基因”,对于一些苦难能生出共情,悲欢相通、休戚与共。然而,在社会生活多元化、个性化的当下,也有少部分人在“行走”中丢失了道德的行囊,不时做出一些突破道德底线的事情。

比如,面对即将跳楼的生命,有人大喊“你倒是跳啊”;面对南京大屠杀纪念馆中一个个亡灵,有人在外穿着不合时宜的衣服,搔首弄姿地拍照……

勿忘过去的苦难、同胞的伤痛,携手共进,这是一种基本的修养,更是我们凝聚家国情怀和民族精神的内在力量。让更多人心中始终装着别人的喜怒哀乐,需要道德教化的力量。

悲欢相通,才是人性的光芒。

抵制“丧文化”,为青少年营造清朗的网络文化

刘效仁

“丧文化”流行、不良网络游戏和周边文化产品渗透到校园、因沉迷网络游戏引发家庭冲突屡见不鲜……日前,在北京市政协十三届四次会议上,不少委员呼吁加速净化网络环境,完善“青少年模式”。(见1月25日《新京报》)

“丧文化”是指青年群体中带有颓废、绝望、悲观等情绪和色彩的语言、文字或图画。目前,“00后”中学生是“丧文化”的主要受众。“悲伤蛙”“葛优躺”等表情包,更是十分流行。

时下,互联网成了年轻人情绪的宣泄口,他们的各种负面情绪、压力、本领恐慌等状态,都会借网络去释放。

“丧文化”的出现,特别是青少年成为其主要受众,着实让人忧虑。“少年强则中国强”,青年的精神状态、价值观、奋斗理念,事关国家的希望和未来。正因此,在青少年中强化“青春是用来奋斗的”“幸福是奋斗出来的”等理念和价值观,无疑十分重要。

事实上,青年人只有朝气蓬勃,有理想、有力量,勇于吃苦耐劳,正视人生苦痛,坦然面对各种压力,才能远离各种颓废状态,成为富有活力和创造性的群体。

抵制“丧文化”对青年的侵蚀,理当从净化网络环境开始。对充斥恐怖、暴力、血腥的网游,“丧文化”主题的表情包、文章、视频等,都需要从源头上阻隔,完善“青少年模式”和举报奖惩措施,建立网络不良信息预警机制等,为青少年营造一个清朗向上的网络文化空间。

当然,网络只是生活的一部分。现实中,无论教育工作者还是家长,都应正视个别青年失去目标、陷入颓废泥沼甚至麻木生存的状态,对其全方位“施以援手”,比如,追溯青少年“丧”的心态根源,扭转“物质富足而精神空虚”的失衡状态;再如,帮助他们培养健康的兴趣爱好,鼓励参加夏令营、冬令营等社交活动,积极融入同学群体、融入社会,学会与周围的人沟通、交流,共同成长;此外,还要帮助他们在努力学习掌握知识的同时,修身养性,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以此引领自己日常的行为。

抵制“丧文化”,要多给年轻人一些“铠甲”、一些力量。

“悲欢相通”,守住基本的善良

樊树林

据红星新闻报道,1月24日,在四川阿坝汶川县映秀镇映秀震中遗址,几名游客在参观过程中不停说笑,被导游怒怼:“请文明祭奠,如果再笑请出去!”网友对此纷纷点赞。

2008年5月12日,汶川地震之殇,留给我们沉甸甸的悲痛。每当回忆起大地剧烈摇动的那个时刻,想起受灾同胞失去亲人的那一声声凄惨的哭嚎,很多人心中都会隐隐作痛。在汶川县映秀镇映秀震中遗址的残垣断壁前,几乎所有游客都在肃穆乃至哀伤

中静静地祭奠,相比之下,上述新闻中的几名游客不时嬉笑,对苦难、对生命竟然没有丝毫敬畏。

导游的这一声怒怼,得到网友们的纷纷点赞,足见公众对维护公序良俗有着最基本的是非观。“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必须明确的是,地震遗址和一般旅游景点是不同的,这里的一草一木、一砖一瓦都承载着人们悲痛的记忆,记录着灾难来临的瞬间和抢险救援的过程。这也就决定了人们在参观时应该抱持的态度和心理。

旅游是一种消费体验,更是公众和眼前的景色产生情感互动的一种方式。到肃穆、

庄严的地震遗址参观,目的无非是缅怀、纪念和哀悼。这样的地方,不是笑逐颜开的地方,不是寻开心的地方。

鲁迅的《而已集·小杂感》中曾有这样的描写:“楼下一个男人病得要死,那间隔壁的一家唱着留声机,对面是弄孩子。楼上有两人狂笑;还有打牌声。河中的船上有女人哭着她死去的母亲。人类的悲欢并不相通……”今天,在我们的社会方方面面有了巨大发展与进步的情况下,类似“人类的悲欢并不相通”的情况竟然在地震遗址出现,实在让人遗憾。

犹记得,2018年12月,有相声演员在表演中拿地震苦难抖包袱,称“大姐远嫁唐山,